

湖州百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之 考索与建议^{〔1〕}

顾志兴

藏书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尤其是浙江,自宋以来源远流长,著名藏书家、藏书楼迭出。至本世纪初,全国藏书楼以收藏之富称,有四家并列,即是湖州陆心源的百宋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山东聊城杨绍和的海源阁和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然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从湖州传出了一个足使中国学术界、藏书界感到震撼的消息:百宋楼全部藏书以十一万八千元之价售与日本岩崎男爵的静嘉堂文库。对于百宋楼藏书的“舶载以东”一事,汾阳王仪通曾有诗十二通记其事,其十一云:“三岛于今有西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空,望睫文姬返汉关。”藏书家董康闻知此讯后初颇疑惑,后经证实确有其事,十分痛心地说:“按陆氏《藏书志》(顾注:指《百宋楼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大息累目。”愤激之情,溢于言表。百宋楼藏书虽然东流入静嘉堂文库已经88年,但影响至今犹在。对于百宋楼藏书之价值、出售经过与原因等有探讨研究的必要。

一、陆心源与百宋楼藏书。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祖籍浙江临安,世居吴兴(今湖州市)。年轻时资质过人,好读书。年三十通九经,精郑许之学,为万青藜、吴式芬、张锡庚诸名士及先辈徐有壬、朱绪曾等赏识,引为忘年交。由于他学识广博,时人把他和同郡的姚咨谔、戴望、施补华、俞刚、王宗羲、凌霞等六人共称为“七子”。清咸丰九年(1859)陆心源中举人,遵例以知府分发广东,后为奉督刘长佑所荐去直东豫交界剿“匪”。同治四年(1865)任广东南韶兵备道时,曾与太平军余部作战。据《清代七

百人传》载,陆心源颇嫉恨当时吏治腐败,在直隶、广东等地为整顿吏治、革除弊政做过一些“商民皆悦”的好事。后以“丁艰”回湖州家乡一段时间。同治十一年(1872)福建总督李鹤年因佐治需人,奏调陆心源赴闽,总办税厘、通商等事务,并兼任海防、粮盐等事宜。后因与上司不合,又乞假归湖州。清光绪十九年(1893)经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举荐,陆心源恢复原官职,并经光绪、慈禧召见。不久在天津得病,次年十一月九日,逝世于湖州故里,终年六十一岁。

综观陆心源的一生,不失为封建社会里的一名干练的能吏。但陆心源一生行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大藏书家。在这两方面贡献更大。陆心源著作等身,所著有《仪顾堂文集》二十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续跋》十六卷、《金石粹编续》二百卷、《穰梨馆过眼录》四十卷、《续录》十六卷、《唐文拾遗》八十卷、《续拾》十六卷、《宋诗补遗》一百卷、《群书校补》一百卷、《吴兴诗存》四十卷、《吴兴金石记》十六卷、《归安县志》四十卷、《宋史翼》四十卷、《元祐党人传》十卷等,功力颇深,所著合署《潜园总集》共九百四十余卷。

陆心源的藏书活动始自青年时代。据李宗莲《百宋楼藏书志序》称:“余少识潜园先生于乡校,时先生方以博闻缀学雄诸生中。每试,学使者为之特设一榜。先生歉然不自足,志欲尽读天下书,偶见异书,倾囊以购。”及至陆为官以后,陆仍致力于搜书藏书,诚如李宗莲所言“后膺特简,备兵南韶。余私揣南韶剧任,又值羽书旁午,当无读书之暇矣。未几,丁封公艰,归装有书百篋,人皆迂而笑之。余以为先生夙好固在此,而歉不自足,犹昔日也。乃复近钞远访,维日孳孳,林间六年,有何假南面之乐。诏书再起,权总闽漕,被构罢归,誓墓不出,而求书之志益勤,

殆苏长公所谓薄富贵而厚于书者耶!”所以概言之,陆心源从青年时代起,一生中第一事业便是搜书藏书。

陆心源一生藏书在十五万卷以上。其中最珍贵的藏书是宋元旧版,主要得自苏、浙、沪藏书旧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藏书是江南藏书精华。例如,其时上海藏书以郁松年最为有名,郁之先世经营沙船业,家富资财,广搜书籍,人称其“藏书数十万卷,多宋元佳槧。”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引《师友渊源记》:“松年饶于财,凡宋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板废者,不惜重资,以罗置鄞架。吴门黄氏百宋一廬所藏,归山堂汪闾源家,近亦散布而入沪读矣。”后同治间郁氏之书散出,陆心源购得其中四万八千余册精藏,举其要者有蜀大字本《左传》、宋耿秉本《史记》、残蜀大字本《汉书》、《后汉书》、宋一经堂本《后汉书》、咸平本《吴志》及《三国志》、淳祐湖州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宋大字本《诸臣奏议》、宋本《欧公本末》、汴都刻《小畜外集》、宋开禧本《周益公大全集》、宋端平刘炳本《宋朝文鉴》、蜀大字本《三苏文粹》、元庆元路本《玉海》、《东京梦华录》、元元统二十八卷本《归田类稿》、元至治嘉兴学本《秋涧先生大全集》、元四十三卷本《金华黄先生集》、元西湖书院初印本《国朝文类》以及其他宋元刻名人手校手抄本等。此外陆还购得同里严氏芳崇堂、刘氏眠琴山馆、福州陈氏带经堂、归安韩子蘧、杨秋室、江都范笈、吴县黄尧圃、周谢庵、德清许周生等著名藏书楼散出之书,加上陆家旧有藏书,故陆氏藏书既富且精,称其为“素缣细帙,部居类汇,遂为江南之望”,这是名实相符的。

陆心源旧居在今湖州市月河街,他因所藏宋本书已达一百余种,遂将原有藏书楼辟出一部分专藏宋元珍本,定名百宋楼。百为二百之义。宋版书至明代时已很珍稀,以叶记银定价。乾嘉时吴县黄尧圃曾收藏宋本百余种一时名重天下,故称其藏书室为“百宋一廬”,及至清末宋版书更成稀世之珍,陆心源所藏一百余种,隐然有驾取百宋一廬之义。陆氏在月河街另一藏书楼称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的秘刻及精钞本、精校本,如《明文海》,明仿宋版《大戴礼》、旧题元刻《说苑》等。陆心源于莲花庄筑潜园建守先阁藏书楼,所藏之书价值亦高,如藏有宜稼堂旧藏稿本等。近代藏书史研究专家叶昌炽就曾说过:“公子纯伯(即陆树藩)中翰尝为余言:“守先阁藏明人集至多。吾吴先哲,如都南濠,杨君廉、皇甫司勋之类,无所不有。登阁传抄,候之异日,谨书于此,以

当息壤。”

二、百宋楼藏书与日本岩崎氏之经过和评价。

陆心源的百宋楼十余万卷藏书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距陆心源之死仅十三个年头。关于百宋楼藏书的出售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从日本方面来说,对于百宋楼藏书是志在必得。日本东京的静嘉堂文库是由三菱财团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岩崎弥之助所创建的,时间大约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的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在文化方面,出现了洋学流行、轻视汉学的倾向。对此岩崎氏是颇为不满的。为此他利用其巨大的财力,不惜资财重金搜罗古籍,于东京骏河台邸外建立静嘉堂文库,委托著名汉学家重野安绎博士主其事。静嘉堂文库自创办以来,所藏古籍主要为一些通行刊本,如《十三经》、《十七史》、《资治通鉴》等,后又陆续增加了《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及府县志等。明治四十年(1907),静嘉堂文库又购得汉学家所添光鸿旧藏五千九百九十六册及岛田重礼旧藏四十余种,扩大了静嘉堂文库藏书,但文库所藏珍本古籍并不很多。

陆心源死后,由其子陆树藩主持家政。时有日本版本目录学家、人称“中国图书通”岛田翰(字彦桢)来华,他在中国游历访书与其时南北藏书家多有交往,曾作《访余录》记其登瞿、杨、丁、陆入藏书楼阅书经过,清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之交曾数登百宋楼“悉发其藏读之”。其时陆家藏书已未加妥然保护,岛田所见“尘封之余,继以狼藉,举凡异日之部居类汇者,用以饱蠹鱼”。岛田一眼看出这些藏书的价值:“我邦藏书家,未有能及之者。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他下定了“必欲致之于我邦”的决心,于是岛田遂反复恣恻、鼓动陆树藩劝其出售藏书。陆始讨价五十万两,又减至三十五两,后再减至二十五万两,这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八日的事。岛田翰待售书价格略有眉目后,二月间即返日本与田中青山商量,田中青山以为“能任之者,独有岩崎氏耳,余将言之。”与此同时,岛田翰又与重野成斋会商促其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重野成斋有西欧之行,特地转道来华,与陆树藩会晤于上海,经一再谈判,四月

最后议定以十万银圆(一说十万八千银圆,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价格将丽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售与静嘉堂文库。^[2]是年六月,尽船载以东,流入静嘉堂文库。应该指出的是,日本静嘉堂文库今日已成为日本收藏汉籍中宋元古本最富有的藏书所,在所藏一千一百八十三种汉籍善本中,有宋刊本一百二十七种,元刊本一百五十五种,明刊本五百五十一一种,明钞本七十二种,还有少量的金刊本、元钞本及清代名家的手钞本、手跋本二百六十九种,其中极大部分精华即得自陆心源的丽宋楼。

丽宋楼藏书的流入静嘉堂文库,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势在必然。我在撰著《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时,曾对此加以探索,但囿于所见,对陆树藩售书在因采用了通常的说法“陆树藩坐吃山空,对家藏图书之价值又不甚了了,加以岛田翰的一再怂恿与鼓动”来概括,这无疑是对的,但原因恐不止此。我多年来虽一直关心地方志乘,终无所获。近见陈玉堂先生所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陆树藩条有简要记述:“曾在上海经营湖丝,因亏欠巨款,将其父之丽宋楼藏书,尽数卖与日本岩崎。”我对此材料是颇信眼的,这合乎情理。这里有个相类的材料,同为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杭州丁丙八千卷楼藏书同样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距丁丙之歿八年以后,丁氏后人因经商失败,亏空巨万,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以偿赔。这年六月陆心源的丽宋楼藏书全部售与静嘉堂文库,据齐耀琳《江苏第一图书馆复校善本书目序》中称:日人转而又“复耽耽于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此消息一出,国内学术界人士十分担忧国宝再度外流。此时正值端方(1861—1911)任两江总督,听说八千卷楼藏书亦将散出,遂请江苏著名藏书家缪荃荪(筱珊)到杭州与丁氏后人洽谈,最后以七万五千元的低价成交,全部藏书由端方所创议建立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收藏。在这点上丁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以低价将藏书售与南京,使八千卷楼故物不致散失,故缪荃荪在《艺风堂文漫存·丁修甫中书传》中亦加称:“自遭家难,君拚挡所藏悉还公债,而不留丝毫,以备一己之需,固杭人所共谅。至于书籍,全归江南图书馆,价虽稍贬,而书无所逸,易一地耳。书固可按目而稽。在江南,犹在丁氏,君筹之熟,计之决,识者尤知其苦心矣。”

藏书人家,书之聚散无常,自古皆然,对陆树藩本无可深责。然陆树藩与丁修甫相比总觉两人有所差别。这是因为当时张元济先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

曾有收购陆氏丽宋楼遗书之议,且最终价与日方相当。据王绍曾先生《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披露: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前张元济十分关心陆心源死后的丽宋楼藏书,曾两赴湖州欲登丽宋楼观书,但均遭陆家托辞拒绝,而岛田翰于张先生之后却被允许两登丽宋楼观书,并谈及以重金购买全部藏书,初因陆树藩索价过昂而未果。张元济先生闻听此讯,先愿出八万元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收购,而陆要价十万元,张先生因一时筹措不到这笔款子,故暂从缓议。张先生出于爱护祖国文化遗产,托人劝告陆树藩,切勿售与日本方面^[3]。待张先生凑足十万元款时,而“陆氏却已以十一万八千元售与日本岩崎男爵”^[4]。对此,不仅张先生,而有一切热爱祖国文化的人无不感到十分痛心,喻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惨祸。

探讨丽宋楼藏书与日本静嘉堂文库,致使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流入东瀛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和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密不可分。首先是,清政府没有制定一定的法令制度和办法,自近代起任凭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流失而不加限制。例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千佛洞佛窟坍塌,被王道士修洞时发现洞中藏有两晋以来至宋初大批写本书、艺术品,估计不下有二万五千多卷,包括儒家经典、史籍、经卷、契据等,是研究我国中古史、文学、文字学等方面的无比珍贵的资料,对此清政府置之不理。而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闻风而至,各择其精者三千余卷,盗骗捆载而去,其中包括现存最早咸通九年(868)年的雕板印本《金刚经》和约绘于8世纪的、现存世上最早的、绘在纸上的《敦煌星图》。对珍贵文物、典籍其时若有文物出口法等的规定,情况至少是好一些。尤其是丽宋楼藏书,张元济先生曾向清政府建议过,由国家进行收购,他在《致缪荃荪书》中说:“丙午(1906)春间丽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和,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所以我认为丽宋楼藏书之东流除了陆树藩的责任和岛田翰的怂恿、鼓动,乘人于危、必欲得这而后快不良居心外,当时腐败的清政府实也难辞其咎。

丽宋楼藏书的出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而且中介人岛田翰确有利用陆树藩经营湖丝失败急需款项及对藏书价值不甚清楚等弱点而购置的。故此,当时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术界、藏书界人士对此表激愤之情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是爱国精神的

表现,这需要充分的肯定。在时间过了八十八年的今天来思索,我以为“望赎文姬返汉关”这样的愿望似难实现,因为当年是“买断”而非“典押”,而且丽宋楼藏书之与斯坦因、伯希和之盗骗敦煌卷子、与日本军国主义在中日战争期间肆意掠夺中国文化遗产性质毕竟不同,同时应该肯定的是丽宋楼藏书归静嘉堂后得到了妥然的保护。据我所知,近代自张元济等先生还从静嘉堂文库借照的有影钞本《群经音辨》一种、《册府元龟》(残本)、《陈书》、《新唐书》、《武经七书》等宋刊七种;明刊《饮膳正要》一种等,至于近时日本访华学者也闻时有从静嘉堂文库复印原陆氏藏书来华交流。这自然比“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要好得多。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我以为本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为进一步开展中日两国学术文化交流,建议浙江有关部门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方面进行接触联络,商洽有可能将丽宋楼原藏或复印、或摄成缩微胶卷交浙江保存。若能如此,既可告慰于已故关心丽宋楼藏书的前辈前者的在天之灵,亦可为中国学术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一佳话,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若此建言有可采纳之处,有赖于中日双方学术界来共同促进。

(上接100页)譬如:国内杂交水稻品种的出现,平均每亩增产50公斤粮食。在农业种子的品种上,要有“当家的品种、搭配的品种、接班的品种”。科技人员要相对稳定下来,以便熟悉本地区 and 相应配套的高产技术。要高效、稳产、低耗(省工)探索和建立高产模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最后,卢良恕院长应本报之请,高兴地故乡题词:“合理开发利用丰富的资源,为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多作贡献。”

从对卢院长的采访和随他在家乡与科技人员、工人、农民和干部进行朋友式的交谈中,他一再阐述:“要重视草的资源”。所以,我想:这番话不仅仅是对湖州,对其它类似的地区也是很有启发的!

最后,我就以专家论草为中心内容,写出了《聆听专家一席谈——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卢良恕教授》的人物专访稿。在《湖州日报》上刊出,尔后得到《浙江日报》社等单位编辑的推荐,先后在全国发行的《发展战略报》、《农村信息报》、《古榕报》上转

注:

- [1] 本文为作者1995年3月参加“江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撰《丽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及元湖州本〈景德传灯录〉日本覆无本之考索》论文的第一部分。
- [2] 岛田翰为日本版本目录学家,陆树藩将丽宋楼藏书全部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岛田翰为中介人。光绪十三年(1887)岛田翰于北京刊印《丽宋楼藏书源流考》详载丽宋楼藏书出售于静嘉堂文库经过。据我所见,此为丽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之唯一重要书面材料。近接陆氏后裔,现在苏州的徐桢基先生来信所告:“……岛田翰来华是日方已与树藩公约好拟购藏书后专程来华看书的,因而能数登其楼,岛田翰一书中有许多不实和有意虚构之处。”据此,对于此问题值得再探索,俟再考。
- [3] 徐桢基先生致我信中说:“张元济先生为挽救丽宋楼藏书作了大量工作,可惜资金缺乏力不从心。而知树藩公以十万银元售日后,再去联系时,树藩公已与日方签定合约。唯日方要求保密故对张进行了虚允。”
- [4] 徐桢基先生说:“真正售价日方出十二万银元,假使去除佣金10%则亦有可能为十万八千元。”

载刊出,受到了科技界的好评。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人物专访的新闻稿在写作时也颇费周折。起初,我写了近6千字,内容面面俱到,没有把卢良恕教授所谈的中心思想写出来,可以说这篇初稿是粗而浅、浅而散了。后来,我又将采访卢良恕教授的整个过程反复“过滤”了一下,才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专家论草的主题。

当然,记者的新闻人物采访艺术,远不止拙者以上所谈的四点,它还需要记者有较强的采访活动能力,能够以一颗至诚之心广交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使采访对象将你所需要的采访内容,甚至他的内心思想、家庭隐秘等毫无保留地告诉记者,使记者能够写出一篇更加真实、更加生动、更加完美的好作品。

注:

- [1] 丁彬莹:《曹禹谈记者要有基本功》,载《新闻战线》1982年第四期。